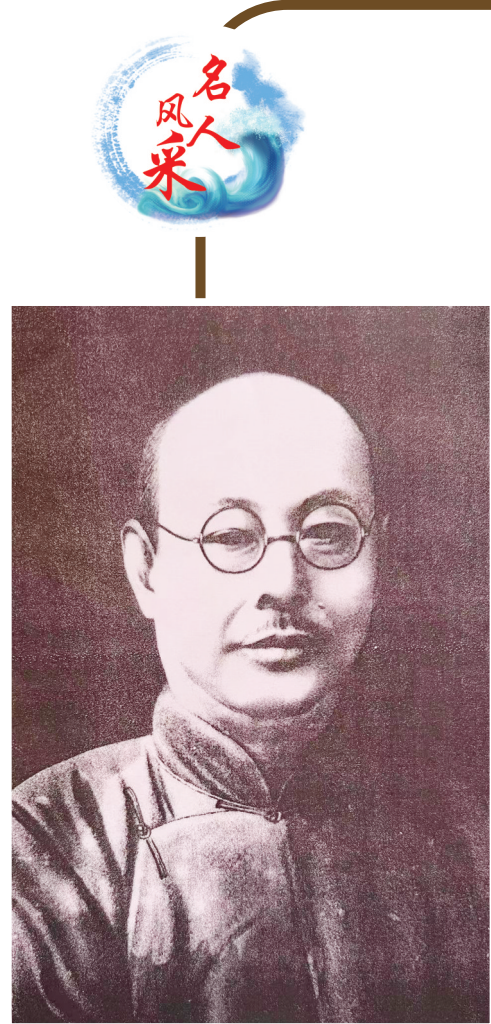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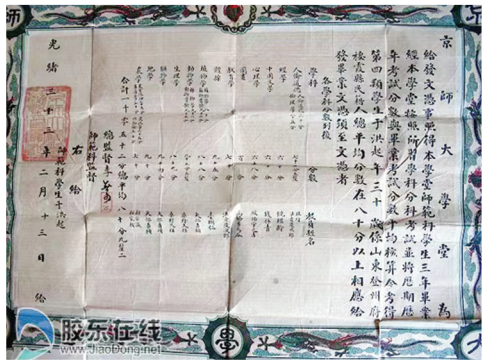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名士于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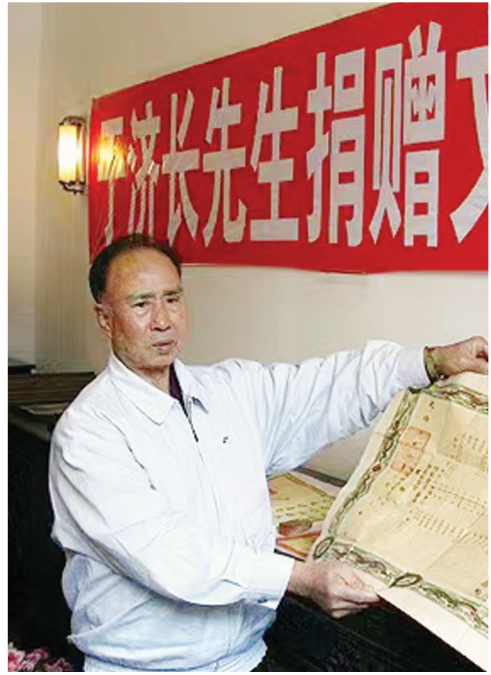
□张荣起 王友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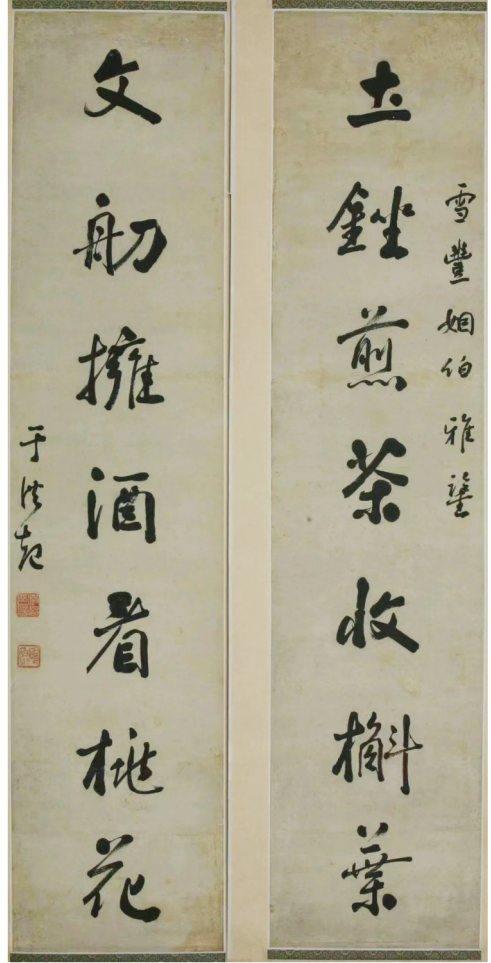
于洪起。



于洪起的毕业证书。



于洪起晚年于济长向烟台市博物馆捐赠文物。



于洪起作品。

在同盟会栖霞四君子(谢鸿焘、李凤梧、栾钟尧、于洪起)中,可能因居家时间较短等原因,于洪起的事略资料并不多,读者通常能见到的不过是几百字的简介而已。然而,笔者追踪他的生活轨迹碎片发现,若论学识之渊博、阅历之丰富、交际之广泛、文墨造诣之深厚,级别之高、影响之大,当首推于洪起。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山大教授,曾任山东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等职的孔子76代孙女孔令仁的亲外公。

矢志救国 兴教育人

于洪起,字范亭,栖霞市蛇窝泊镇清河河口村人。1877年9月2日(清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在北京经商,父亲于梓林弟兄三人都在京城翰林院供职,于洪起自幼随父在京读书。时当满清政府腐败昏庸、列强觊觎瓜分中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于洪起耳濡目染,在心灵深处,已埋下救国强民的种子。想救国,就要反封建、争民权、谋平等,这在当时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人已率先卷入维新变法甚至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大潮中。于洪起19岁时,踌躇满志地回乡,应科试、补秀才,以自己在京城所见所闻广泛宣传“救国强民”的观点,尤其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常与大舅哥李凤梧等同龄人一起评论时弊,畅谈志向,很多年轻人深受其影响,于洪起的名字也随之闻名乡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一则新闻传来,因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等动乱被关闭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重新恢复招生授课。于洪起尊父命回家,考取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博物专业。1903年前后,胶东兴起一股东渡扶桑、寻求救国道路之风,于洪起深受震动,跃跃欲试。巧的是从1903年起,京师大学堂也开了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之先河,于洪起有幸于1905年获得游学日本的机会,并很快与同乡革命义士徐镜心、谢鸿焘等取得联系,并首批参加了孙中山和黄兴当年在日本创立的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初,于洪起以优异成绩拿到京师大学堂的毕业文凭,分到山东提学使司学务公所任职,并兼任山东高等学堂和山东优级师范教习,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矢志救国的同盟会会员们一致认为,为将先驱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希冀变为现实,兴办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和智性的启蒙,是最可依托的途径。于洪起利用这一机遇,全心投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灌输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教育新思想。他协助谢鸿焘创办烟台东牟公学,积极宣传废除科举制度,振兴教育、开办新学,并以学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各地革命青年来此求学者达200余人,教员均由同盟会员担任。一时间东牟公学精英荟萃,校园成为辛亥革命在胶东乃至中国北方的策源地与摇篮。黄兴的弟子、湖南被称为桃源三杰(另两位是宋教仁、覃振)之一的胡瑛也应邀前来任教。1908年7月,于洪起到青岛,参与了青岛震旦公学的创办。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学校除设立文化课程外,还开设了军事学和军事技术训练等科目。在教师生一律留短发、穿军装,学校还专门采购了枪支。除学习外,学校师生经常去工厂、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学校名声随之远播。于洪起还与陈干、刘冠三等成立以学界为主体的山东矿产保存会(亦称“五路保矿会”),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反对德国人侵略山东矿权的斗争。由于清政府与德国殖民当局相互勾结、里外夹击,震旦公学被迫解散,于洪起被迫于1909年春南下粤西,任农林学堂教习。当年秋天,应山东巡抚孙宝琦之请,回山东任谘议局秘书。谘议局是清政府新建机构,内部有封建顽固和倾向革命两个派系(人称二六党和清流党),于洪起利用合法身份,与山东同盟会会员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在省内开展革命活动,对推动山东宣布独立奠定了基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次第光复,于洪起复回烟台,卷入政治斗争10多年。期间,新式学堂在全国面上开花。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洪起应李凤梧之邀,带着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在烟台发展国民党工作的指令,担任先志中学校长,崔唯吾任教务主任(暗中做国民党烟台党支部负责人工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来传单,号召全国学生积极参加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残害纱厂女工、杀死工人顾正红的罪行。先志中学学生会立即邀集中市中小学生在潮州会馆举行誓师大会,学生代表振臂演讲,激发了与会学生的爱国热情。会后,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路击鼓吹号,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登上烟台山,路经英、日领事馆门前时,学生们放缓脚步,连呼口号,有的学生甚至将传单抛进领事馆墙内。领事馆门前虽有岗哨,但面对气势汹汹的游行队伍,却不敢有任何行动。此后,先志中学又组织全校学生分组深入大街小巷进行演讲,以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

先志中学是于洪起连续执教时间最长、发挥潜能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的教学时段。1927年,他协助家乡蛇窝泊村创立了霞光小学,从校名的确定、校牌的书写到校长的遴选、教员的擢用,他无不亲历或建言。

于洪起治校,教书育人并举,深得学生拥戴。传承其精神,出类拔萃的弟子,不乏其人,对推动共同抗日起到积极作用。

1927年,曾隶属奉系军阀的山东督办张宗昌,密令东海道尹逮捕在烟台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崔唯吾。得到消息后,崔唯吾等国民党党员连夜离开烟台,学校停办(后学校与渤海中学合并,名为东海中学,即山东省立烟台八中前身),于洪起则去了南京,专心从政。

廉政惜民 肝胆照人

作为革命党人,于洪起的从政之路,是从担任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的顾问开始的。

1911年11月12日晚,烟台继武昌起义之后,在山东率先起义成功。但由于经验不足,被应时赶来的清军舞风号炮舰管带(舰长)王传炯窃取了临时军政府司令之职,险些断送革命前程。幸亏革命党人及时识破,紧急救援,徐镜心、栾钟尧、丁惟汾、谢鸿焘等分头到上海、南京会见陈其美、黄兴、孙中山等革命首领,并建议委派曾在东牟公学任教的胡瑛统兵北上,及时取代了王传炯。参与革命的义士们扬眉吐气,各司其职,烟台立时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于洪起有群众威信,能荣膺胡瑛顾问之职,既说明胡瑛对他的赏识,也能看出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的信任。

1912年,于洪起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他深入群众宣传革

命思想,并参与策划周村、潍县等地的反袁斗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又投入更大规模的讨袁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了,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于洪起仍任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1日张勋导演复辟闹剧,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之,闹剧很快垮台。孙中山回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于洪起追随前往,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10月,曹錕在北京贿选大总统,选票从5000元涨至数万元一张,山东数名议员失节助曹,于洪起愤然撕毁选票,与丁惟汾、于恩波等拂袖离京,赶往上海,协助孙中山促成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7年,于洪起离烟到南京,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参议。1928年江苏省政府成立,于洪起出任秘书长。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中国资源贫乏论的论调,助长帝国主义侵华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志气和信心,实际是在为帝国主义服务。学博物物的于洪起深知中国是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他援引充分证据,撰写《中国资源贫乏论》一文,有力批驳了悲观失望的错误论调,并应邀到各地作报告,宣扬中国是地大物博有光辉前途的国家。听过报告的人,深受鼓舞。从1931年开始,于洪起担任国民党中央检察院委员一职,与监督院院长于右任合作共事多年(直至去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洪起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他对官场的腐败很看不惯,曾撰写《格物浅释》,抵制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在国民党官员中,妻妾成群现象普遍存在,于洪起看不惯别人娶二房、纳妾,他自己也不娶二房。他的妻发生了两个女儿后,长年不孕,不少人劝他娶二房以续子嗣,他坚决不允。有个好友买一妙龄少女送他做妾,不等他表态回头就走。他不忍把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子推出门外,只好让妻子认她做干女儿,后寻得一朴实可靠青年把她嫁了,而他,直到大女儿17岁时,妻子才生育了唯一的儿子。

于洪起官职不低,但从不管官架子。他穿着朴素,待人谦逊,每次回故里总是在村外下轎子,然后徒步进村,不分男女老幼,都按辈分称呼。从次日开始走访乡亲,越是贫寒者,他越上心。他不失时机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与理想,劝说家人不要置办田产。有人不理解,笑他做官不发财,是傻瓜。他的故居遗址非常简陋,根本找不出高阶大户的痕迹。

有一次,于洪起由青岛乘火车回南京,因拥挤找不到座位,只好一直站着。这时,有一个自称县长的人因找不到座位对乘务员大发雷霆,于洪起看不惯,就走过去说:“先生既是县长,就是百姓的公仆,有什么理由要威风呢?”见人不屈,于洪起掏出工作证件又说:“如果说当个县长就不能站一站,我这个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岂不应该躺在座位上吗?”一席话说得那个县长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战争岁月,国无宁日。他动员年轻人参军抗日,其中他本村就有于召读等五位青年先后考入黄埔军校,有的还参加了缅甸远征军。

然而,于洪起并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1940年,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他高血压病猝发,抢救无效,于10月17日离世,享年63岁。他生前坚信抗日必胜,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曾多次上书批评。他始终赞同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因此他的逝世使当时的进步人士深感悲痛。逝世一个月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出褒扬令,称赞他为国会议员“持正不阿、誉望尤孚”,参加护法之役“艰险备尝,弗渝永志”,任监察委员“清勤直亮,建白尤多”。与此同时,栖霞县亦在清河河口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一生的贡献和道德风范作出高度评价。

于洪起交由他的警卫员保存的一些证件和文物被带去了台湾,后来转由于洪起的晚輩(干儿子)于济长保存。台湾博物馆获悉后,曾多次交涉,要求将这些文物留在台湾,于济长根据于洪起一生眷恋故土的理念,始终未予答应。2008年,于济长通过本村于氏后裔与烟台博物馆联系获准收藏。4月23日,75岁的于济长专程从台湾赶来,向烟台市博物馆捐赠遗物十余件,其中包括京师大学堂毕业证、民国政府任命书、鸡血石阴阳章、父印泥版、磁碟照片、楷书对联、小楷条屏等。这些遗物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珍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丰富了烟台市博物馆的馆藏,也增加了整个社会对于文物捐赠的热情和对近现代文物的保护意识。时任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辛俊玲说:“这批文物填补了烟台市博物馆缺少近代文物和史料的空白,对于研究近代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于济长替于洪起圆了“物归故里”之梦后,如释重负地说:“这些文物回到故乡,才是最好的归宿。”

学海造诣 惠及后人

于洪起兴趣广泛、勤奋笃学,不仅通达博物所涵知识,诗词书法、人文历史、礼仪时政等也无所不通。他的学识紧密联系现实,并与教育后代相融合。他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期间,每封家书都会千叮万嘱,不准任何人用任何理由给女儿芊芊和西华裹脚,“如有违背,定不算完”。当时农村妇女裹脚是天经地义,鲜有越轨,于夫人顶住各方面压力,终于保住两个女儿免遭裹脚的痛苦。后来长女到了学龄,于洪起将家眷接至京城,让女儿读书。于洪起不仅用自己学习的套路要求女儿,而且将“自律修身”的美德传之。芊芊刚到北京时说一口山东话,同学们笑称她“小山东”,明显有讽刺意味。过了一段时间,恰逢初一,按当时校规要给孔夫子的牌位叩头,大家都毕恭毕敬地列队前往,芊芊说:“对不起,今天大家都要和我这个小山东去向老山东磕头了!”从此大家不再叫她“小山东”了,因为老山东是老圣人,叫她小山东她岂不成小圣人了!

于芊芊在父亲的调教和影响下,品学皆优,后来走进孔家八府,成为第75代孙孔祥勉的夫人。于芊芊与丈夫在一起生活四十年,先后生育了三男五女八个孩子,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第三个孩子孔令仁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能在大学教书,能写一点东西,是和母亲的辛勤教育分不开的。”

于洪起书法造诣颇深,行楷参以魏碑,尤以草隶见长,深受人们喜欢。他每年都会回乡探亲,求书者盈门,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有求必应。为了求字人方便,他还定下先远后近的规则,让远道来的人早些回家。

他所赠文字均含寓意。1933年,栖霞县立第五初级小学求写一匾额,他提笔略思,写下“为民先锋”以励之。此前他捐建了本村小学——栖霞县第四初级小学,还亲拟励志楹联并书写了“精忠爱国”横批,被镌刻在校门两侧及门楣上方。栖霞市文管处藏其10幅作品,草书潇洒飞腾,隶书整齐清朗、端庄大方,给人以清晰醒目之感。他的作品能流落乡间如此之多,可见其一心向民的品格。

行村镇坐落于海阳的西南角,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白沙河从身边匆匆流去,过了行村镇前边就是大海了。行村与徽村、东村、夏村曾并称海阳的四大名村,行村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汉朝时期,昌阳县治于此。三国魏时,设高丽城。金代时期,建衡村镇。明代时期,设行村寨。清代时期,设行村汛。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千年古镇。

1972年,行村镇杜格庄的一位农民像往常一样挖地取土。忽然,土下露出了一个墨绿色的东西。他并没有在意,以为是什么破瓦砾陶瓷之类。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再继续往下挖时,竟然铲出了四件从未见过的器物。一件是陶罐,而另外三件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玉璋、牙璧、有领环。这三件玉器的出现,就像当年陕西西杨村人挖井,无意中挖出了很多陶制品碎片,从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一样。这位农民无意中揭开了胶东龙山文化的面纱。

在进入正题前,先说下什么是龙山文化。说龙山文化之前,先看看山东远古文化的文脉。自新石器时代,擅河海之富、居山林之饶的山东先民,在这片大地上,先后创造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完整的谱系,清晰的脉络,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从这个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龙山文化上接大汶口文化,下承岳石文化。考古专家把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文化遗存称作龙山文化,发生年代一般界定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4000年,因发现于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济南市章丘区)而得名。

行村镇杜格庄村西白沙河岸边,也就是村民取土的那个地方,有一高台,一看就不像是大自然的作品。它高约7米,直径10米,是一个纯土堆积的东西。其四周全是平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却给它取了好个听且有故事的名字——试马台。我翻阅史料、文献,发现了这样的记载:“汉昌阳故城北有土台高丈余,周百余丈,俗呼试马台。”从这个史料不难看出,那时候这个试马台的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今天之所以变成一个“瘦弱的老者”,不是沧海桑田,而是由于人们挖地取土。当年记录的“周百余丈”的试马台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个土柱子,兀自屹立于平原上,苍凉而孤寂。当地人说,试马台是北宋大将穆桂英的点将台,当年穆桂英领兵抗辽时,曾在这里点将准备出征。这实在是在有点神编,不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穆桂英这个人,就算真有其人,又怎么能从这沿海一隅出兵抗辽?大概是这里的人们太爱自己的家乡,便把这位女英雄拉来助力。

现在人们终于知道,这并不是穆大元帅的点将台。那个被称做试马台的土堆里藏着一个曾经繁荣的舞台,龙山文化的支脉竟然延伸至此。今天,胶东人都与这个龙山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行村古镇,不只有试马台,这里是一个宏大的龙山文化宝藏。杜格庄村西500米处,当地人称“西城子”,村的西北处,有一高1米、南北长约40米、宽2米的高台地,人们称为“西郭”。村南为“南城子”,村东500米处为“东井子”。村东靠近白沙河西岸有一处汉墓群,曾出土陶罐、陶壶、铜壶、铜镜、剑、矛、弩机、箭镞、铁斧、铁犁头以及西汉中、晚期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钱币等文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两千年前,在这山海之间,一定有一个热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地形起伏和缓,连绵不断的低矮山丘杂处无序,东、西、北三面不远处有盆子山、垛山、黄山环绕。垛山像山丘中的伟丈夫俯视着脚下这片山地。白沙河带着牟格庄河、杜格庄河、围子河等几个小兄弟在山丘中戏闹游弋,它们快乐着冲出山地,一路向南直奔大海。两千年前的先民以此为基,背靠青山面朝大海,创造了极为繁华的一幕。如今从地下挖出来的,便是先民谢幕时留下匆匆撒落的遗物。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西汉中晚期,昌阳城西迁至此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是胶东的繁荣之所。试马台南面不远处,是汉代昌阳古城遗址。西汉中晚期,昌阳自文登西迁至此,设盐官署,属东莱郡。王莽当权时期昌阳改称凤敬亭,到东汉时又改为昌阳,那时这里是胶东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公元298年也就是西晋元康八年,昌阳北迁至富水河北岸。

今天的试马台,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而渺小的土堆,几株荆棘伏在上边,像秃头老人的几根头发,在微风中瑟瑟发抖。当地几乎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更少有人懂得它存在的价值,只有专家才能它的身上看到依次展示的汉代文化、周代文化、岳石文化、龙山文化的绝妙。它见证了海阳历史的各个时期。试马台不是传说中的点将台,而是先人生活的地方,几千年前他们在这里创造了胶东半岛的古老文明。

行村还出过一位历史名人,这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十大猛将之一“隋铁枪”隋世昌。在写作此文前,我还不知道这位常常出现在影视剧和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威猛之人竟然与我同乡。他的父亲隋宝是金朝末年的管军都总领、怀远大将军,驻军行村。就在隋宝镇守行村海口的时候,隋世昌出生了。隋世昌是隋宝的第四个儿子,身长八尺,自幼跟从父亲在军营生活,深受父亲的影响,骑一手好马,射一手好箭,还熟读兵书,精于韬略。公元1234年,元军灭掉了金王朝。隋宝看金王朝已经彻底完蛋,便收拾行囊,带着人马归降了元朝,随后被任命为莱阳县令。这时候,隋世昌便参加了元军,成了战胜南宋的一员猛将。他手持一把四十斤大枪,在马上左右突击少有敌手。

我们看看隋世昌的征战历程吧。

公元1253年,隋世昌首次率部与衰败的南宋军队在淮北一带作战,因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很快被晋升为马军队官。四年之后,被提拔为马军千户。马军千户能统领一千人左右。大约过了三年,隋世昌从前线归来同时被改任为步军千户,率部回家乡行村镇守行村海口。

元朝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大军南下攻打南宋。至元七年,已是滹梁万户副都镇抚的隋世昌奉命镇守襄樊地区的万山堡,他修筑“一”字城因襄阳和樊城得到上司的赏识,被晋升为管军千户。至元九年,隋世昌在樊城附近的鹿门山大败宋军,再立战功。

襄樊大战后,元军顺流而下,对长江下游的南宋城市展开攻击。在这些城市攻坚战中,隋世昌又多次立功。与宋军交战,宋军听到他的名字都避而远之。扬州平定后,他充任四城兵马使,并入朝觐见了皇帝。皇帝爱其才,赏其功,任命他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

至元二十三年,六十一岁的隋世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因长期征战留下的金疮复发身亡,其子孙将其葬在了今天行村镇何家村西北部。

隋世昌一生战绩无数,只是历史少有提及,家乡父老也并没有以其为荣,更不用说歌颂。当年岳飞率岳家军挡住了金人南下的脚步,被称作抗金英雄,而隋世昌虽然一生征战无数,为蒙人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却并没被尊为英雄,或许是因为他的大枪上沾满了汉人的血。

行村正在成为历史,行村也在不断发展。



投稿邮箱:ytrbzbk@126.com